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3.08.001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白立超.“民心是阵”:战国儒家兵学思想演变考论——兼论清华简《天下之道》学派属性与学术价值[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48-158.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3.08.001.



Citation Format: BAI Lichao. Popular support as the tactical;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an military though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n the attribute and academic Value of the Law of existence and extinction of a state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3(5):148-158.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3.08.001.

“民心是阵”:战国儒家 兵学思想演变考论

——兼论清华简《天下之道》学派属性与学术价值

白立超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清华简《天下之道》以攻守的兵学概念和言说方式讨论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文意清晰,在兵儒融合以及先秦儒学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是开放和多元的,其兵学思想暗含了孟子和荀子等孔门后学对待战争、兵学的态度。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儒者强烈抨击战争,缺乏战争常识,反对兵家思想,否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而《天下之道》提出“民心是阵”,以兵学概念来表达儒家的民心想,显然这并非孟子或孟学的作品。战国后期,荀子秉持儒家思想,积极了解战争,主动研究各国兵制、武器等。尤其是荀子主动充分吸收兵家思想,如重视将帅作用、讲究作战时机、治军崇尚赏罚等。荀子兵学理论中谈到如何取胜的具体操作层面,其思考丝毫不亚于当时的著名兵书。在此基础上,荀子将这些兵家之术作为实现儒家兵道、政道的重要方式,《议兵》正是在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充分吸收兵家思想而完成儒家论兵的集大成之作。从先秦儒学史来看,《议兵》的出现并非偶然,《天下之道》等文献正是荀子之前的先秦儒者试图融合兵家思想的具体努力,是荀子论兵的先声。先秦儒者融合兵家思想的线索一直以来隐而不显,而《天下之道》的发现使得这条暗线为学界所认识,并且可能激活了长期以来误读的一些儒家论兵的文献,对丰富儒家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天下之道》;兵儒合流;民心;《议兵》

中图分类号:K223;B222;E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3)05-0148-11

清华简《天下之道》共七支简,简背有划痕,无篇名,整理者取首简前四字为题。据碳十四测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尚书》新论:以近年新出土文献为中心”(20FZSB012)

作者简介:白立超,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bailichao1984@163.com。

清华简抄写时间在公元前305年前后,即战国中后期,《天下之道》的成书年代当在此之前。整理者指出这篇核心议题是天下之道,天下之道即攻守之道,“而攻守之道关键在于得民心”^{[1]153},具体为“民心是守”“乘其民之心”“民心是阵”等。此篇文献重视民,强调民心,所以整理者断定“清华简《天下之道》应该是一篇儒家的论兵之作”,并进一步指出“与孟子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2]。当然有学者指出《天下之道》是孟子之前的文本^[3],是否在孟子之前或之后,笔者认为尚无确切的证据。亦有学者否认了整理者的基本判断,认为《天下之道》为兵书,非儒家文献,并列多条证据^[4]。笔者认为整理者判定其为儒家文献基本准确,当然亦有调整和补充之处。大体而言,《天下之道》文义相对明晰,引发的学术争议相对较少,因此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亦较少^①。笔者认为此文献的重要性可能不仅体现在文本的理论价值,而且应对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予以考察。由于儒家论兵的传世文献相对较少,笔者拟以此文献为契机,考察孔子之后先秦儒者对战争、兵学的态度及其演变,钩沉战国时期儒家融合兵学的学术史,厘清先秦儒学对兵学的不同主张与学术脉络。笔者拟将《天下之道》置于先秦儒家论兵的学术脉络中考察,并准确定位《天下之道》在儒学史上的地位,敬祈方家指正。

一、《天下之道》非孟学考

整理者明确指出《天下之道》与孟子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此判断仍有讨论的空间。《天下之道》的核心要义是重民,以民、民心为根本,而民本思想又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如徐复观曾经从“民本”等七个方面讨论孔孟荀思想的通义^[5],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天下之道》重民、谈民心而判定其更接近孟子思想^[6],有必要就孟子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兵学思想予以辨析,才能进一步廓清《天下之道》的文本属性。

战国中期兼并战争日益残酷,据孟子主要活动时代可以推断,孟子可能经历了马陵之战、河西之战、襄陵之战、齐宣王伐燕等重要战争,尤其齐宣王伐燕,孟子置身其中,并参与了意见。面对荼毒生灵的战争,孟子高举儒家仁义大旗,言必称尧舜,除痛斥战争和偶尔迎合君主游说外,几乎从不主动谈及战争。就《孟子》文本而言,孟子在当时的思想界主要回应墨翟、杨朱等思想对儒学理想秩序构建的挑战,即孟子的判断:“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7]5903}因此,孟子提出仁政的解决方案。在理想的仁政方案中,战争没有任何地位。从现实角度看,孟子事实上并不真正懂得战争,更不愿意去了解战争、研究兵学。大体而言,笔者认为孟子的兵学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孟子对战争的态度基本是愤慨、控诉、抨击、斥责,只是一味反对与排斥。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7]5920}孟子不仅控诉战争的罪恶,还激烈批评与战争相关的兵家、指挥战争的将帅:“故善战者,服上刑。”^{[7]5920}正如黄朴民指出:“孟子是要在强调学派对立的前提下,通过排斥、反对的途径来确立自己军事思想的正统地

^①学术界就此篇文献性质的研究有:程薇《清华简〈天下之道〉初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176-180页);子居《清华简八〈天下之道〉解析》。以《天下之道》的某个概念为契机的研究有:田旭东《从〈天下之道〉的“道”与〈孙子兵法〉的“道”看二者的异同》,见氏著《笨学小识:田旭东自选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83-190页);洪德荣《〈清华简(捌)·天下之道〉考释两则——兼论其兵学思想》(《古文字研究》(第33辑),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55-458页)。

位。”^[8]基于这样的态度,孟子对天下统一方式的判断完全是南辕北辙、儒家式的一厢情愿:“不嗜杀人者能一之。”^{[7]5807}

其次,孟子完全否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意义。孟子在游说时即使面对君主询问战争,也是巧妙化解,甚至不惜歪曲史实引入仁政思路。如齐宣王曾问齐桓公、晋文公如何成就霸业,孟子明确指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7]5807}孟子此语显然与孔子评价齐国霸业的史实并不相符。孔子曾明确评价:“晋文公谄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谄。”^{[7]5456}对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也有较高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7]5457}孔子从维护礼乐秩序的高度肯定齐桓公的霸业和管仲的贡献。孟子却认为“春秋无义战”^{[7]6034},否认孔子所称道的春秋霸主对天下秩序的作用。可以说,孟子甚至不惜歪曲史实,否认孔子的判断,也要撇清儒家与战争的关系。

再次,孟子缺乏基本的战争常识。战争是战国时期的核心议题,孟子言论中往往或是主动、或是被动,亦会谈及战争。就《孟子》文本而言,孟子谈论战争时违背现实战争的常识或实际。据笔者统计,《孟子》涉及战争或军事问题的篇章共23处^②,多是对战争的批判与反对,甚至不屑。孟子在与梁惠王谈论时,提出如果魏国推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7]5800},显然违背基本常识。在谈论战争时,孟子的军事语词非常匮乏。《孟子》文本中直接提及战争装备等,仅有两处,而且都是大而化之,非常简单。涉及兵器也是常见的鼓、兵、甲等,如“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7]5798}。《天下之道》文本中出现“渠谿”这样比较生僻的兵器,“渠谿”是非常重要的守城之具,现有典籍仅存于《墨子·备城门》《淮南子·汜论训》中:“城上之备,渠谿、藉車……”^[9],“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谿以守”^[10]。显然与孟子论兵的方式以及匮乏的战争常识扞格不入。根据战国形势,孟子的一些论述从现实战争角度来看,完全是错误的,如“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7]5910}。显然,“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在战国时期是割地亡国的前奏,是任何一个诸侯国的灾难。

最后,孟子谈及战争较少,未有系统论述,多为仁政张本^[11]。孟子和其他儒者相同,强调“人和”,以政治为本。“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7]5858}。孟子与梁惠王主动谈及战争:“王好战,请以战喻。”^{[7]5798}实为其仁政说张本的比喻而已。孟子如何以仁政谈战争呢?仁政基调下的战争就是“仁者无敌”^{[7]5800},“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7]5991},战争过程是敌国民众箪食壶浆迎王师,“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7]5918}。在齐宣王询问是否出兵燕国时,孟子也是以民心、仁政为原则推演、回答。当然是否出兵,孟子的意见模棱两可,以致齐国战败后有人斥责孟子“劝齐伐燕”^{[7]5866};在吞并燕国与否的问题上,孟子建议“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7]5830},当然齐宣王亦未听从孟子的建议,在攻陷燕都后,大肆烧杀抢掠。

②涉及军事或以军事为喻的27处为《梁惠王上》(1.3,1.5,1.7)《梁惠王下》(2.10,2.11)《公孙丑上》(3.3,3.7)《公孙丑下》(4.1,4.4,4.8)《滕文公下》(6.5)《离娄上》(7.1,7.2,7.9,7.14)《离娄下》(8.31)《告子上》(11.18)《告子下》(12.4,12.7)《尽心下》(14.1,14.2,14.3,14.4)。其中编号以梁涛《孟子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为准。

因此,根据孟子的论兵特征,笔者认为,虽然孟子否定战争,重视民心与《天下之道》是一致的,但是孟子谈论战争时缺乏基本的兵学常识,从文本涉及兵器十分匮乏等方面来看,与《天下之道》关注战争,主动以儒学为根本来融合兵家理论的基本立场相去甚远。孔子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些许肯定战争的正面价值以及对正义战争的肯定,在战国时期是否会成为一种坚持儒家基本立场,又能够主动关注战争及切实研究融合兵家理论的一种可能呢?笔者认为事实上是存在的,如果以现在理解先秦儒学的历史坐标来看,《天下之道》显然是这类文献较为早期、不成熟的文本。

二、《天下之道》学派属性与学术史意义

《天下之道》文本篇幅较小,抄录如下:

天下之道式(二)而改(已),式(一)者獸(守)之(之)之器,式(一)者攻之(之)之器。今之獸(守)者,高元(其)(城),深元(其)(注)而利其楯隳(渠譖),蒿(厚)元(其)臥(食),是獸(守)之道。昔天下之獸(守)者,民心是獸(守)。女(如)不(得)元(其)民之情爲(偽)、肯(性)教,亦亡獸(守)也。今之攻者,多元(其)車兵,至(臻)元(其)撞(衝)階,以發(發)元(其)一日之妄(怒),是非攻之道也。所胃(謂)攻者,寃(乘)元(其)民之心,是胃(謂)攻。女(如)不曼(得)□□之情,亦亡(無)攻也。

昔三王者之所以取之(之)之器:式(一)曰遯(歸)之以中以安元(其)邦,式(一)曰遯(歸)之擘(謀)人以斂(悅)忘(之心),式(一)曰臙(戾)元(其)脩(修)以繫(麗)其眾。□□昔三王之所胃(謂)幟(陣)者,非幟(陣)元(其)車徒,元(其)民心是幟(陣):式(一)曰礪(礪)之,式(二)曰儻(勸)之,三曰駮(駮)之,四曰慙(壯)之,五曰戮(鬪)之。五道既成,乃速用之。女(如)不曼(得)用之,乃募(顧)僕(察)之,女(如)弗(察),邦冢(家)元(其)鬪(亂),孫(子孫)不肅(昌)。^{[1]153}

《天下之道》文本以天下、道器、攻守等观念作为基本架构谋篇布局,以道器观统摄整个文本,并尝试提升文本的理论水平。笔者认为显然《天下之道》作者运用并不成功。《天下之道》对“道”“器”的概念界定并不明晰,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171}的道器论相去甚远。即使如此,《天下之道》的主旨仍非常明确,就是民、民心。《天下之道》论“今之守者”“今之攻者”时多处提及非常专业,甚至较为生僻的攻城器具,这些要素是兵家强调和研究内容,事实上却是文本作者并不完全赞同的要素。因此,认定《天下之道》是兵家文献有失公允。《天下之道》以“攻守之道”为叙述架构,以兵家言说方式和语词来统领整个文本,又极力将其儒家化,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并不接纳兵家的核心主张。以兵家话语体系来讲述儒家的基本主张,是一篇典型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兵儒合流的文本。《天下之道》的思想内容本身比较简单,容易理解。文本认为天下之道可以区分为守天下和攻取天下两种方式。对当时守天下的方式,如高城深池,多渠道,储备粮食的方式并不完全赞同,而理想的方式是以民心为守。对当时多兵车、多冲车等军备竞赛表示反对,更对战争的不理性提出批判。认为攻取天下当以民心为攻,取得民心,才能取得天下。文本以三王为故事,通过中道安邦,以谋人取悦民心,通过修身使百姓归附。三王以民心为阵,民众只有通过“五道”而教才能参加战争,要时刻观察民心的向背。

显然,《天下之道》是儒家文献。笔者拟在整理者的基础上,再补充四个证据。首先,《天下之

道》文本出现中懋(勸)、懋(壯)等心字底的异体字,笔者认为此与郭店楚墓战国竹简中大量心字底文字的出现可能相关,与当时儒家的思想倾向、文字演变以及用字习惯相关,可能是特定时代的儒家文献的文字特征,这些所论内容大多与“思考或者情感有关”^③,这样的用字习惯和具体内容却并非被更关注外在规则的兵家关注。其次,“情伪性教”的论述是儒家文献的重要特征。对“性教”的论述,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7]3527}对“情伪”的论述,早期传世文献见于《左传》:“民之情伪尽知之矣。”^{[7]3960}大量出现在郭店楚简、上博简中,其中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更是集中讨论“情伪性教”的专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12]“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12]。有关“情伪性教”的论述是战国中后期儒者的重要议题。作为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有关“性伪”的论述更集中、深刻、精密:“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13]412}再次,对民、民心,尤其是教民的深刻认识。笔者认为,就民、民心、教民内容而言,这是儒家一贯的思想。其中,《天下之道》重点论述的“五道”教民思想,具有特色。先秦儒者孔子最早提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7]5450};孟子有“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7]6006}的提法。荀子亦有相关论述:“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13]291}“不教而责成功,虐也”^{[13]522}。相比较而言,荀子有关教民的思想比孟子更丰富、更具体。正如萧公权所言:“孟子于养民之要不厌反复申详,而教民一端则多附带及之,仅举梗概。”^{[14]93}

就目前而言,儒家文献中是否存在与《天下之道》同一类型的文本呢?笔者认为上博简《曹沫之阵》正是此类文献,如重视政治,尤其重视民在战争中的作用:“邻邦之君明,则不可以不修政而善于民。不然,任亡焉。邻邦之君亡道,则亦不可以不修政而善于民。不然,亡以取之。”^{[15]246-247}认为政治的作用比战更争根本:“有固谋而无固城,有克政而无克阵。三代之阵皆存,或以克,或以亡。”^{[15]251-252}抑或是“战有显道,勿兵以克”^{[15]268}的论述,与《天下之道》否定“兵”的作用几近相同。更关键的是《曹沫之阵》也涉及对民之“情伪”的论述:“君勿惮自劳,以观上下之情伪,匹夫寡妇之狱讼,君必身听之。”^{[15]265}在传世文献中,作为儒家文献的《逸周书》中有《武称》《大武》《大明武》《小明武》等文献,往往难以理解,或被认为“属于兵书的《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等七篇,与兵书《六韬》有相似之处,有学者甚至认为是抄自《六韬》而做了改变”^{[16]34-44}。笔者认为,即使是编订者抄兵书,这显然也是一种态度、一种认可,甚至是主动吸收,显然这种方式可能太过于简单。对于《逸周书》,有学者指出:“从目前已有的材料看,《逸周书》很可能是编订于子夏学派,是儒家主外派的一部文献汇编。”^[17]

事实上,除《天下之道》外,无论在出土文献中,还是在传世文献中,事实上存在着儒家主动融合兵家理论的文献。我们据此断定,在荀子之前,先秦儒家学派中一直存在对战争相对比较理性认识的传统,有主动吸收、融合兵家理论的儒者,而这一思想倾向为荀子所继承,并形成了理论水平很高的儒家论兵之作《议兵篇》。

③白奚《“仁”字古义考辨》(《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96-98页)。同时,在讨论中,对民的情伪的重视与《系辞上》中“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系辞》传统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其为儒家重要的文本,当然近年来以陈鼓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其为稷下道家的作品。

三、荀子本末兼具的儒家兵学理论

战国时期,作为始终关注现实治理的儒家,战争问题终究难以回避。就目前所见的先秦儒家传世文本,荀子是儒者中对兵学理论有过深入研究、吸收和整合兵家理论的代表人物。荀子虽未著兵书,但《荀子》中有兵学专论《议兵篇》。荀子充分汲取了兵家理论的合理成分,体现了战国中晚期诸子兵学思想由对峙向融合过渡的基本趋势,并“使自己对战争问题的思考从政治学领域真正跨入了军事领域”^[8]。这也是先秦儒家兵学理论由孔子,经《天下之道》《曹沫之阵》《逸周书》等兵论的长期曲折探索,到荀子最终成熟。

首先,荀子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李泽厚曾言“荀与孔孟的共同点,其一脉相承处是更为基本和主要的”^[18],荀子谈兵也是以“仁义”为本,正如陈嚣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13]279}我们从孟、荀引《诗》亦能发现其一脉相承之处。如孟子和荀子同引《文王有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7]1134}他们以《诗》为据,为各自理论下“王师”或“人师”张本: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7]5849}

荀子亦曰:

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13]279}

同时,孟子、荀子对战争过程的描述也大体并无二致,他们同以父母、子女的关系为喻来描述敌我双方交战的场景:

……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7]5850}

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讎。^{[13]269}

荀子对战争的态度非常明确:“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途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13]279-280}荀子此论与孟子所谓“诛一夫”“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7]6035}的思想并无二致,甚至荀子对“仁义之兵”的描述更加理想化^[11]。

其次,荀子主动客观了解战争,对战国时期各国军制、武器等非常熟悉。荀子对战国时期的战争、各国军事制度以及军事实力的认识非常客观。《议兵篇》十分精准地齐之技击、魏氏之武卒、秦之锐士三者实际战斗力排序,完全符合当时三国军事实力的实际,这显然与孟子罔顾现实的态度不同。荀子面对即使无儒、实力又最强的秦国,他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就军事制度而言,对“齐人之技击”“魏氏之武卒”“秦之锐士”的军制如数家珍。如对魏氏之武卒的描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

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13]272}此论非常全面、细致、专业,不亚于兵书,迄今为止仍是我们了解魏国武卒制非常重要的文献依据。就战国兵器而言,荀子知见之广博,令人叹为观止。如关于楚人以蛟革犀兕做成坚硬的重甲,宛地良弩距来^{[19]260}、铁鉞的记载:“楚人蛟革犀兕以为甲,鞣坚如金石;宛鉞铁鉞,惨如蜂蛰,轻利漂渺,卒如飘风。”^{[13]281-282}《议兵篇》中仍有一些生僻的军事术语难以获得正解,足以证明荀子战争知识的广博,仅举一例。《议兵篇》曰:“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埤陇种东笼而退耳!”此语中“角鹿埤陇种东笼”最难解,各家众说纷纭^④。笔者推测,“鹿角埤”“陇种”“东笼”可能均为战国时期战场上的重要兵器或者工事,其他典籍未载,若对战争没有真正深入研究的人可能无法了解。

再次,荀子不仅正面对待战争这一现象,而且将兵家理论纳入儒家体系。荀子对待战争的态度与孟子等截然不同。面对残酷、常态化的兼并战争,荀子直面战争,不再回避,“军事力量被荀子作为他那个时代不可回避的事实接受了下来”^{[20]313}。荀子在否定兵家唯兵制、兵器、战术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又对兵家用兵之术有条件地认可,尝试以儒家理论的高度统摄兵家的具体战争理论,这与大多儒者不同。荀子兵学理论的落脚点是儒家之“道”,基本立场是对仁义的坚持,对民心的肯定。兵成为实现仁义、维护仁义的必要手段,因此“仁义与兵表面之矛盾相即解除,本末之间亦即打通”^{[21]135}。荀子在不否认桓文节制的前提下,理想仍是汤武的仁义,并将春秋霸业置于儒家的理想之治的序列中:“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和齐之兵也,可谓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13]276}虽然荀子的理想是王道,但对霸道并不完全排斥。荀子指出霸道致命缺陷:“非服人之心也。”^{[13]205}面对兼并战争,荀子提出自己看法:“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13]290}可以看出,荀子认为兼并战争这样军事打击固然重要,甚至相对简单,而政治上的凝聚更根本、更长远,才是目的、才是出路。荀子的基本态度和大体思路均归本于儒家,归本于礼和仁义:“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13]266}这正是荀子尝试融合兵家,又与兵家的区别所在。

最后,荀子在具体战争领域全面融合兵学理论。荀子在《议兵篇》大量吸收兵家理论中如何取胜、具体操作层面,其兵学理论思考丝毫不亚于当时的兵书。韩非曾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⑤笔者据此推测,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非常有可能对《孙子》《吴子》等兵书非常熟悉。事实上荀子的兵学思想正是在充分吸收这些兵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笔者拟以《议兵》对照今本《孙子》《吴子》的内容,钩沉荀子研读、集大成兵家思想的证据,兹举几例。第一,重视将帅

④杨倞指出“其义未详,盖皆摧败披靡之貌”。刘台拱、郝懿行、王先谦等亦未有发明,语焉不详。笔者认为陈直指出“此句脱误太甚,不多强解,为角鹿埤鹿角之颠倒字”,并据《太平御览》引文“鹿角埤”的提法,“鹿角盖为兵家之一种防御工事,始见于东汉末期,盛行于三国之际,疑在战国时已有此设备”。鹿角埤,又称鹿埤,是古代战场一种守卫用的栅栏、营垒,因形似鹿角,故称之。笔者猜测,此处可“鹿角埤”断句,埤为坚土、硬土。以坚土硬土成形似鹿角的防御工事。“陇种”,据顾炎武《日知录》引用《旧唐书·窦轨传》“公之入蜀,车骑、驃骑从者二十人,为公所斩略尽,我陇种车骑,未足给公”。又指出《北史·李穆传》“陇冻军士”,认为“盖周、隋时尚有此语”。顾炎武未做进一步申述,“陇种车骑”一词与“车骑、驃骑”对举,显然与军事密切相关。“东笼”可能也与军事相关,但不宜强解。参见:陈直《读金日札·读子日札》(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8页);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4页)。王天海亦指出“角鹿埤”三字疑作“角鹿埤”,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05页)。

⑤当然,韩非此处“孙吴之书”学术界仍有争议,此处“孙”是孙武,还是孙臆,笔者不再赘述。就论述方便而言,笔者姑且以《孙子兵法》为依据来展现儒家对先秦兵学理论的融合,特此说明。见王先谦《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2页)。

的诸多精彩论述。战国文武分途,将帅专业化,将帅的指挥水平对战争胜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战国兵书中大量出现专门论述将帅的内容^[22]。荀子同样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也是着力最多的内容。《议兵篇》中提出为将“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圻”的理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先秦兵书,超出了《孙子兵法》将之五德“智、信、仁、勇、严”^{[23]7}的内容,正如韦政通所言“就荀子论为将论军制之说合而观之,无一点不肯要,无一点非兵家之奥义通义,后世论兵者,其大纲大目,无有能外于此者”^{[21]138}。具体而言,《议兵篇》中明确要求将帅冷静指挥:“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13]277-278}《孙子兵法》指出君主和将帅时刻要保持冷静:“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23]283}就军事指挥权问题,《议兵篇》曰“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13]277}。《孙子兵法》明确反对君主掣肘:“君命有所不受。”^{[23]171}又曰:“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23]57}亦曰:“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23]226-227}将帅指挥应重视战机,当机立断,切忌犹豫。《议兵篇》言:“知莫大乎弃疑。”^{[13]276}《吴子》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24]150}无论是表述方式还是思想内涵,荀子与当时兵书认识水平相当^⑥。第二,赏罚严明的治军思想。廖名春将其简要概括为“治军术”^{[25]201-206},但并未具体展开。严明赏罚是兵家治军的核心思想,如《孙子兵法》七计的“法令孰行……赏罚孰明?”^{[23]10}《吴子》在谈到治军时,明确指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24]138}《议兵篇》指出:“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13]277}荀子严明战场纪律时,丝毫看不到儒家的温情脉脉。《议兵篇》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进而退也,其罪惟均。”^{[13]278}此段论述与《孙子兵法》并无二致:“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23]146}

可以看出,“孟子主张仁义,而反军事,荀子虽然也常说到‘仁’字,其重视的则为礼义,而赞成军事。这是孟子思想与荀子不同之点”^{[26]32}。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者坚持儒家重民、重视民心的基本立场,基于现实的考量,主动了解战争本身,融合兵家思想,在兵学理论水平上与孙子、吴子等著名兵家相较,毫不逊色。可以说,“荀子既重仁义,也言实力,既坚持了孔孟等先辈反对残酷战争、提倡仁义之师的原则立场,又清醒地区别了政治与军事之间既联系又不等同的关系,广泛引入兵家的理论,从而使战国中晚期学术兼容大背景下的兵儒合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27]423-431}。因此,荀子《议兵篇》的兵学理论也成为先秦儒学甚至后世儒学融合兵学的思想高峰。

四、《天下之道》在先秦儒学史中的价值

总而言之,《天下之道》文本作者对兵学常识相对熟悉,并且从思想倾向以及具体表述中均表现出主动融合、吸收兵家理论建构自己的学说,与荀子更为一致。即使融合并不非常成功,但也代表着孔子至荀子之间的早期儒者关注时代主题、关注当下治理模式构建,主动了解战争、融合兵家思想的倾向。因此孔子之后,以孟子、荀子作为先秦儒学现有的思想坐标来看,《天下之道》与荀子对

^⑥同样作为兵儒合流的兵学集大成之作《六韬》亦有相关论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六韬·龙韬·军势》见《宋本武经七书》(续古逸丛书本),广陵书社,2010年版)。

战争、兵家的态度一致。笔者认为,这篇文献无论是军事语词表述的丰富性还是思想本身,在先秦思想家的历史坐标中,与荀子更接近。不仅如此,我们在厘清《天下之道》文本属性的基础上,发现《天下之道》对重新审视先秦儒学的发展,尤其是兵学思想的演变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首先,丰富对先秦儒学的认识,尤其是儒者对兵学态度的多样性。笔者认为,清华简《天下之道》的发现,对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先秦儒者论兵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史价值。曾子、子思以及以《礼记》为代表孔门的后学、孟子等代表着先秦儒者认识战争、对待兵家成就的主要态度,但并非全部。其实早在郭店竹简出土后,学者已经意识到“儒学内部的分化并非单线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28]101}。就战争、兵家的态度而言,儒家内部同样也是持不同态度。就儒家思想特征而言,儒家内部对战争以及兵学理论的主动融合可能相对较少。由于儒家对现实的密切关注,战国儒者必然对战争以及兵学有过回应,可能这些回应由于文本较少,理论水平较低,尤其是儒家在历史进程中角色的转变而逐渐为人们所忽视,而清华简《天下之道》的发现为我们重新探讨这一议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天下之道》显然是早期儒学论兵的文本,代表了早于荀子的儒者对战争的思考以及试图将兵家理论引入儒学的初步尝试。虽然理论粗疏、论述简单,但是内容非常丰富。《天下之道》让我们重新审视战国时期儒学的丰富性、多元性和现实性,与孟子时代相近,存在着与孟子学说有所区别,甚至可以称之为荀学先声的思想材料,也能使我们从多维度了解更丰富的儒学。

其次,重新认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儒家论兵材料。荀子的兵学理论代表了先秦儒家论兵的高度,我们不禁思考,此种情况的出现,早期儒家文本也一定存在与《天下之道》类似而又被忽视或者错误认识的文本。据上文所论,先秦儒者对兵家的主动吸收不仅仅存在《议兵篇》这样的成熟文献,仍存在其他一些文本需要重新认识。就出土文献而言,上博简《曹沫之阵》等文献的出现,对其学派归属的争论一直存在,到底是儒家论兵之作,还是受儒学影响的兵学著作,未有定论^⑦,显然这是我们对战国儒家论兵情况不清所造成。同时,《逸周书》兵论也是我们钩沉早期儒者论兵的重要资料。可以说在荀子之前,先秦儒家学派中一直存在对战争相对比较理性认识的传统,有主动吸收、融合兵家理论的儒者。这些先秦儒者可能属于理论建构的少数派,或注重政治实践,留下的兵学文本较少,或兵学文本理论水平不高,流传至今的更少。笔者认为,即使文献本身的理论水平有一定的缺陷,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早期儒者融合兵家理论的难度。

最后,认识早期儒学艰难的理论探索。后世儒者以及学术界较少关注先秦时期少数儒者对兵学的积极融合,忽视他们不断将兵家的合理思想吸纳融合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各种努力。《议兵篇》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战国时期的儒者为了适应时代的主题,在已有的儒家理论基础上,经过了不断尝试、艰难探索的长期过程。由于儒家思想的特征,其与兵家理论的融合难度非常大,一些早期的探索长期以来在先秦儒学史的研究中被忽略了,也在后世儒学史的构建中被遮蔽了,而《天下之道》的发现为了我们重新发现儒家的多元性,寻绎儒家论兵理论的艰难曲折探索,激活更多文

^⑦刘光胜、欧阳楨人等学者认为其为儒家论兵之作,日本学者浅野裕一、王青等学者认为其当为成书年代早于《孙子兵法》的兵学著作,田旭东认为其当为战国写本的鲁兵书,当为折中之论。参见:刘光胜《上博简〈曹沫之阵〉研究》(《管子学刊》,2007年第1期111-115页);欧阳楨人《论兵书〈曹沫之阵〉的思想史价值》(<http://www.jianbo.sd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1&wbnewsid=1914>,2008年4月18日)、《先秦儒家的战争观——从竹书〈曹沫之阵〉到〈孟子〉》(《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29-41页);王青《上博简〈曹沫之阵〉疏证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田旭东《战国写本兵书——〈曹沫之阵〉》(《文博》,2006年第1期91-94页)。

本提供了契机。《天下之道》等文本代表着儒家早期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荀子·议兵篇》的出现并不突兀,而是这个暗线长期发展的结果,“堪称为集早期儒家军事界想之大成者”^[29]。荀子主动了解残酷的战争、研习兵书,本末并举,实现了儒学融合兵学的理论自洽。具体而言,荀子是要以儒家为本、兵家为末,对兵家理论实现全面的整合与超越,兵家所有在具体战争操作领域的主张在荀子这里成为了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正如韦政通所言,“荀子论兵,虽以探本为主,但亦不遗末”^{[21]138}。而学术史的中间环节、承上启下的坚持探索过程也不应被忽视。

参考文献:

- [1] 李学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M]. 上海:中西书局,2018.
- [2] 程薇. 清华简《天下之道》初探[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76-180.
- [3] 杨兆贵,陈书平. 由清华简《天下之道》论先秦诸子天下观[J]. 管子学刊,2020(3)86-96.
- [4] 子居. 清华简八《天下之道》解析[EB/OL]. [2019-06-2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621/21/34614342_844017715.shtml.
- [5] 徐复观.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479-484.
- [6] 金耀基. 中国民本思想史[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53-99.
- [7]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M].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8] 黄朴民. 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异同初探[J]. 历史研究,1996(5):75-90.
- [9] 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孙启治,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1:522.
- [10]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冯逸,乔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3:430-431.
- [11] 白立超. 传统儒家论“血流漂杵”:价值共识与史实考究[J]. 文史哲,2021(6):95-105,164.
- [12]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79.
- [13]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4]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5]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16] 王连龙. 《逸周书》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17] 梁涛. 清华简《命训》“大命”“小命”释疑:兼论《逸周书》“三训”的成书及学派归属[J]. 哲学动态,2021(4):49-60,128.
- [18] 李泽厚. 荀易庸记要[J]. 文史哲,1985(1):12-24.
- [19] 陈直. 读金日札·读子日札[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0] 本杰明·史华慈.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 程钢,译. 刘东,校.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 [21] 韦政通. 荀子与古代哲学[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 [22] 白立超,黄朴民. 论先秦时期战争方式演变与兵学思想递嬗关系[J]. 军事历史,2020(2):1-12.
- [23] 杨丙安.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4] 陈曦. 吴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21.
- [25] 廖名春. 荀子新探[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26] 萨孟武. 中国政治思想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27] 黄朴民. 学术兼容与兵儒合流[C]//. 国际儒学联合会,滕文生. 儒学的当代使命: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 [28] 梁涛. 郭店竹简与孟孟学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29] 黄朴民. 战国孟、荀儒家军事思想论析[J]. 军事历史研究,1989(2):132-138.

Popular support as the tactical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an military though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n the attribute and academic Value of the Law of existenceand extinction of a state

BAI Lichao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P. R. China*)

Abstract: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Law of Existenceand Extinction of a State* discusses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popular support through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ways of speaking. The text is clear and very important in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in the history of pre-Qin Confucianism. Confucius' thought is open and diverse, and his military thought implies the attitudes of Mencius and Xunzi, also and other Confucian scholars' attitude of war and military science. Among them, the mainstream Confucian scholars in pre-Qin period, represented by Mencius, strongly criticized war, lacked common knowledge of war, opposed military thought and denied the objective role of war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The Law of Existenceand Extinction of a State* proposes that "Popular Support as the Tactical" and uses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science to express Confucian thoughts on popular support. Obviously, this is not a work of Mencius or Mencius.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Xunzi adhered to Confucianism, actively understood war, and actively studied the military systems and weap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Especially Xunzi actively and fully absorbed the military thought, such as valuing the role of generals, valuing the timing of battles, and valuing the value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in military governance. In Xunzi's military theory, the specific operational aspects of how to win are no less than the famous military books at that time. On this basis, Xunzi regarded these military techniques as important ways to achieve the Confucia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octrines. It was precisely through his full absorption of military ideology that he completed the culmination of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mili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pre-Qin Confucianism, the emergence of *On Military Affairs of Xunzi* was not accidental. Documents such as *The Law of Existenceand Extinction of a State* were the concrete efforts of pre-Qin Confucians before Xunzi to integrate military ideology, and were the precursor of Xunzi's discussion of military. The clue of the fusion of military thought by pre-Qin Confucianism has always been hidden and not obviou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Law of Existenceand Extinction of a State* has made this hidden line known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may have activated some Confucian literature on military that has been misunderstood for a long time, which has very important academic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The Law of Existenceand Extinction of a State*; The confluence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Confucianism; Popular Support; *On Military Affairs of Xunzi*

(责任编辑 胡志平)